

吕梁

武工队

LULIANG
WUGONGDU

谢允中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九三八年的隆冬，
华北大地变成了雪
白的世界。山如银装，林若
玉成。在这严寒裂肤，冷风
刺骨的日子里，一支铁流浩
浩荡荡地挺进着。它象春潮，
以不可抗拒的热力冲击着隆
冬的严寒，为明媚的春天带
来希望。

这是民族的希望啊！

芦沟桥的炮声震醒了灾
难深重的华夏。抗日的烽火
燃烧起来了。到敌人后方去。
把侵略者赶出境，这已成了
炎黄子孙共同的誓言。

八路军一二〇师的干部
，总共数千人，犹如一
利的钢刀，向冀中平原
，这条长龙般的纵队，是
西北的兴岚县出发的。
世闻名的北岳恒山之
佛教圣地的五台山之北，
条条长长的山谷。它犹
如一条蜿蜒的河床，将抗日
的洪流送向前方。山谷西边

的崖壁，陡峭挺拔，气势雄伟。特别是那时隐
时现的五台山，云遮雾绕，气象万千，更激
发起抗日健儿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对在
侵略者的铁蹄下倍受蹂躏的敌占区人民更寄
予深切的挂念。

我奉组织上的命令，由一二〇师雁北扩
军工作团调回来，在这支铁流纵队中，任新
兵连的副指导员。这批新
兵是我们
刚从地方
上征来的，一
集中就
加入了
这挺进
的洪流。



吕梁

武工队

LULIANG

WUGONGDUI

谢允中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吕 梁 武 工 队

谢允中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1/32·印张 $5\frac{3}{4}$ ·插页 3·字数 110,000

1986年12月第1版·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2,000

书号 10137·172 定价 1.00元

呂梁武工隊

余秋里
一九八二年七月

余秋里同志为本书的题字



1958年作者在西藏

第 一 章

一九三八年的隆冬，华北大地变成了雪白的世界。山如银装，林若玉成。在这严寒裂肤、冷风刺骨的日子里，一支铁流浩浩荡荡地挺进着。它象春潮，以不可抗拒的热力冲击着隆冬的严寒，为明媚的春天带来希望。

这是民族的希望啊！

芦沟桥的炮声震醒了灾难深重的华夏。抗日的烽火燃烧起来了。到敌人后方去，把侵略者赶出境，这已成了炎黄子孙共同的誓言。

八路军一二〇师的干部大队，总共数千人，犹如一把犀利的钢刀，向冀中平原插去。这条长龙般的纵队，是从晋西北的兴岚县出发的。在举世闻名的北岳恒山之南，佛教圣地的五台山之北，有一条条长长的山谷。它犹如一条蜿蜒的河床，将抗日的洪流送向前方。山谷西边的崖壁，陡峭挺拔，气势雄壮。特别是那时隐时现的五台山，云遮雾绕，气象万千，更激发起抗日健儿对祖国大好河山的

热爱。对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倍受蹂躏的敌占区人民更寄予深切的挂念。

我奉组织上的命令，由一二〇师雁北扩军工作团调回来，在这支铁流纵队中，任新兵连的副指导员。这批新兵是我们刚从地方上招来的，一集中就补入了主力部队，加入了这挺进的洪流。

在行军中，我真担心这些新战士们受不了。我虽然嘴上没说，但认为随时有人会哭鼻子、掉队、闹情绪。可是，我完全估计错了，我们的新战士是好样的。他们日夜兼程，长途跋涉，不顾疲劳，精神振奋。他们一有空就唱着我刚教给他们的歌，虽然音调并不准确，但情绪却十分感人：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

不怕雨，不怕风，抄后路，出奇兵；

今天消灭一个营，明天夺回一座城……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出境！

我那时虽然已是连级干部了，但年龄并不大，也只是个十八岁的小鬼。好多新兵的年龄都比我大。拯救民族的命运把大伙凝聚到了一起；战争把正常的人生阶梯也打乱了。在各种年龄的新兵面前，我这个“连长”当得倒还真有意思！

他们见我爱说爱笑，性格活跃，便一致选我当歌咏

员，负责辅导同志们学唱新歌子。我第一次教他们唱《到敌人后方去》只是出于工作需要，没想到竟挣得了这么个头衔。这虽然是赶鸭子上架，倒也有好处，逼得我去学会了二十多首歌。这阵子，人们最爱唱《游击队之歌》——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也许是我们的队伍要到冀中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吧，每唱着这首歌，我们总感到格外的亲切，似乎每唱一句，都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啊，战争将考验着每一个热血的青年，祖国的命运维系在每一个抗日健儿的心尖，个人的忧戚又算得了什么呢？

是的，这算不了什么。我是这样向新兵们做思想工作的，自己也是这么去安慰自己的。只是在长途跋涉之中偶然触及到了什么，勾起了自己的心思，成天乐呵呵的我才变得沉默起来。

记得快离开五台山上时，我在行进的部队中扭回头去，以依依不舍的目光遥望着那白雪皑皑的北台顶时，蓦地在我心中产生了想家之情。这银装素裹的北台顶在我的视野中是多么熟悉呀！

我的家乡就在五台山的北麓。童年时代就常听老人们说，北台顶蒸不熟饭，因为那座山太高了，顶峰的积雪是终年不化的。北台顶的东面有五个小山峰，呈一字形排开，人们不把它们叫做五福临门，却起了一个怪名字：“五鬼拉灵”，因为它象征着死亡。尽管我的家乡处于滹沱河的南岸，过年过节时乡亲们总爱喜气盈盈地贴上一副对联。

“门临南岳联峰秀，屋靠沱水万里流”，可是，它仍然不能为善良的百姓带来吉祥。

我十六岁那年，父亲带着我在一个寒冬的夜里，为逃避地主的阎王债，背乡离井，远走口外，受尽了人间苦难。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了，我和父亲在逃亡的人流中失散了。这真是雪上加霜啊！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

从这个悲惨的时候，我就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可是，我那可怜的老父亲呢？此刻，他在哪儿？他可曾知道家乡已经沦陷，日本侵略者的碉堡已经修筑在村南的打谷场上，乡邻们在穷苦的生活上又增加了死亡的威胁？

啊，故土，亲人，为儿的虽然正行进在抗日的队伍里，可哪一天又不把你们牵挂呢？

年迈的母亲还健在吗？姐姐、哥哥的近况又如何呢？那最小的弟弟，如今还成天嚷着肚子没吃饱吗？记得有一次，我不忍心见你老缠着妈妈哭，竟扬手打了你的耳光。这些，你还记得吗？又能原谅我吗？

我就这么随着大部队走着，照样给新战士们教歌，照样给他们讲抗日的道理，也照样在心里悄悄地怀念着我的家和亲人。白天，只要一翻过山口，刺骨的寒风便迎面扑来。这时候，战士们都缩着脖子，但我相信，他们也跟我一样，正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夜晚，只要一住下来，疲劳便迫使人们再也不想动弹，倒头便睡。这时候，大家的睡姿虽然千姿百态，鼾声也各不相同，但我相信，他们也跟我一样，不是梦见了自已的亲人，就是又回到了生我养我的

家乡。那嘴角勾起的微笑，那唇边淌下的口水，都有着醉人的芳香。在那将和侵略者展开厮杀的抗日健儿看来，它多么地具有诱惑力啊！

一天我们队伍进入河北省阜平境内的一个山村，要在这里宿营。部队在村子西边的打谷场上集合起来，原地坐下，等待分房。夕阳西下，夜幕将临。

这时候，一阵“得得”的马蹄声传来。尘土飞扬的路上，一行人风尘仆仆地奔来。

“是首长看我们来了！”是谁最先喊了出来。

果然，走在最前边的就是干部大队的余政委。他身着灰色军装，腰扎皮带，佩带左轮手枪，打着裹腿，穿着草鞋，服装整齐，仪表威武。他在路旁勒住马，轻巧地翻身下马，向我们中队走了过来。

“起立！——”中队长见首长来了，连忙发出口令，迎上前去，举手敬礼：“报告首长，四中队二百二十人全部到齐，正在休息，请政委检阅。”

余政委说：“让部队坐下。”

中队长转过身来喊口令：“坐下！”

部队整齐而又迅速地坐了下来。

政委面带笑容地走到大家跟前，举起右手，亲切地向大家招手，答谢同志们的热烈鼓掌。

就在这时，旁边一位新战友低声问我：

“副指导员，这位余政委怎么没有左臂？”

另一个又接上：“你看他那左袖筒，空的！一条胳膊

上马下马都不用人扶，好轻巧！”

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因为我每次看见余政委，激动的心情又何尝不跟他们相似？但此时不是开小会的时候，我悄悄用眼神制止住了他们。

“同志们！”余政委挥着那只右胳膊，声音十分洪亮：“明天，就是一九三九年的元旦了，我们每个革命的同志，光荣历史又增加一年了！同志们肩负着民族的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更要经受历史的考验，更要勇敢、坚定、沉着，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同志们又是革命的宝贵财产，是革命的种子，是部队发展的骨干，我们担负的任务是极其光荣艰巨的！”

哗哗的掌声响彻在打谷场上。淡淡的暮霭中，余政委那只空瘪的左袖筒随着身体的晃动而摆动着。倏忽间，它有一种神奇的感召力。我深深地感到，一道道亢奋的目光正从一个个即将奔赴杀敌战场的青年眼里射出。

我的眼，潮湿了。作为一名连队的政治干部，我第一次感到莫大的鞭策和启迪。

晚上，在熄灯前，我才告诉战士们：

“你们知道吗？余政委在长征的路上，在一次去云南的战斗中被打掉了左臂的。当时，他虽然负伤了，但仍然坚持指挥战斗，直到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这一夜，战士们久久不能入睡。直到我起来查铺，还有好些都还在辗转。我理解他们，只轻轻为他们掖好被子，就走开了。

是啊，民族危亡，国难当头，一个热血青年不正应该象余政委那样，当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吗？

我再也不去为家乡和亲人苦恼了。

二

我们的大部队连续行军，有时昼夜兼程，走了个把星期，终于进入了行唐地区。

这天，大部队象条龙似的，由西山的一个峪口探出头来，伸出身来，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浩浩荡荡的行军纵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直到日落西山、红霞满天的时候，才轮到我们的中队走出了丘陵，进入平川。

我边走边向斜坡之下的前方瞭望，时值黄昏，夜鸟归巢，点点村庄，炊烟缭绕。近处这一片片好象白玉雕成的枣树林子，连接着平原大地上那如同喷了白漆的杨柳树林，浑然一体，好不壮观。而那一块块平整的田野里，残雪中显露出绿色的冬麦苗儿。又是那样的生机勃勃，惹人喜爱。渐渐地，一弯新月升起来了，树林、田野和村庄都沐浴在一种朦胧的金辉中。好一幅美丽的冬季晚景。我边看边想：啊！祖国这样美好的地方不知还有多少，然而却被侵略者霸占去了。落入了强盗的魔掌之中！一个中华民族的 热血男儿，又有什么比眼看着自己的母亲受蹂躏而难过的呢？！

部队开进了一座村庄。不用说，光看那迎候在村口的老乡，就知道这是老根据地。蓦地，一种颇似游子还乡的亲切感攫住了我。我忘记了长途跋涉的疲劳，真想张开双臂呼喊扑上去。

猛不防，一块热气腾腾的大红薯递到我的手里。原来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娘，正提着一蓝子煮熟的红薯。她的身边还有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一只小手放在嘴里含着指头，另一只小手抬起来拉着老大娘的衣襟。旁边还有几位老大爷忙着把一碗碗的开水，放在两条长凳子上，他们口里不住地说：“同志们辛苦啦！同志们喝水吧！”

看着这些箪食壶浆的老人，我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只是边走边频频点头。我也是庄稼人出身，完全懂得，这一块红薯，一碗开水，所包含的感情，远远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表达清楚的。也许，这些在寒冷的冬夜还守候在村口的老百姓，和我家乡那些穷乡亲们比，也并不富裕，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也是一件棉袄出门的人才能穿；可是，对遭受侵略的祖国，那颗赤诚的心又都在拯救民族的同一旋律中振颤。

祖国，您在流血，可是您值得自豪，您有多么好的人民啊！

武汉、广州失守后，日寇停止了对国民党的正面进攻，加紧施行政治诱降，同时把大量兵力调回华北，集中力量“扫荡”我各抗日根据地。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起，冀

中根据地连遭敌人两次围攻，地区日渐缩小，全部县城被敌人占领，重要村镇，也扎了据点，各处敌人，不时出来烧杀抢掠，斗争极其残酷，形势十分严重。

在这种情势下，我一二〇师奉党中央指示，由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率部队，于一九三九年初驰援冀中。贺龙师长和聂荣臻司令指挥的部队，在冀中平原会师了。敌后抗战的力量有了增强。抗日的部队一天天壮大，其中代号为“亚五”、“亚六”的步兵团队，更是英勇顽强，屡打胜仗。这个部队的山西籍老战士多一些，他们在自编的歌曲中唱出了他们豪迈的誓言：

谁说我们是山药蛋，

嗨！

打起仗来赛铁蛋。

嗨！

我们干部大队的绝大部分同志奉命开到冀中的大清河以北去了。在固安、霸县一带，我们收缴了当了汉奸的反动地主武装的枪支，大规模地发展抗日武装。革命的种子发芽了，开花了，结果了——许多抗日游击支队的旗号象雨后春笋地打了起来。冀中抗日第三支队的政治委员，就是我们干部大队的独臂将军余政委，司令员就是贺炳炎同志。三支队下属三个团，全支队在贺、余首长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转战冀中，屡建战功，成为一支特别能打的新起之秀。

我从干部大队分配到师政治部当干事。在一次连子口的战斗中，我参加了抢救伤员的工作。在炮火连天，硝烟滚滚的战场上，我们把伤员救护下来，送到附近我军占领的村中。

刚进村口，只见一座小学校的门前，站着一位中等身材的外国人。他穿着八路军的服装，看上去有五十来岁，却神采奕奕，精神焕发。那高耸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那打着绑腿的脚下是一双线耳子的草鞋，相比之下，既显得不很协调，又透出某种非凡的气质。他见我们抬着担架送来了重伤员，便“唔”了一声，一摆手，示意我们将伤员抬进学校的教室里去。

放下伤员，我们便在教室门外的小操场上闲聊起来，跑累了，是该歇口气了。

“嘘！——小声点儿！”一个小护士连忙从教室里探出头来，压低嗓门提醒道：“白大夫正在做手术，不许吵！”

“白大夫？哪个白大夫？”一个刚到担架队的小战士问道。

“嗨，你们还蒙在鼓里？——这可是白求恩大夫呀！”

啊，这就是白求恩大夫？！……

我早就听说了，在我们抗日队伍中，有一位非常好的外国大夫。他主动放弃了家乡的优越条件，大老远地跑到中国来，为我们的抗日勇士治伤医病。即便是在枪炮子弹从屋顶上吱吱横飞的环境里，他也总是亲手为伤员同志们

做手术。他不顾疲劳，精心治疗，及时抢救，使许许多多的伤员同志从死神那里解脱出来，伤愈之后，又重返前线英勇杀敌。难怪不得我们部队里的一些战士诙谐地说：

“上了战场只管冲，别怕，负了伤有我们的白大夫哩！”

我们师政治部的干事于平同志，脸上长了一个疮，痛得要命。他跑到卫生所去找医生治疗，正遇上白大夫端着一盆污水出去倒掉了，刚返回来。当白大夫知道他是要治疗面部的脓疮时，便一把手将于平拉到手术台前，打上麻药，亲自给他动了手术，敷上药，包扎起来。不几天，于平的伤痊愈了。他逢人就说：

“连我这点小毛病，也劳驾白大夫亲手操刀，我要是再不上前线亲自撂倒几个鬼子，我咋有脸再见白大夫？”

部队在冀中平原积极活动，白天多半是休息，夜间便摸黑转移。在夜行军的行列中，时常可以听到贺师长和白大夫走在征马前头，通过译员进行亲切交谈：

“河间战斗，鬼子使用了毒瓦斯！”是贺龙师长的声音。

“太惨无人道！”翻译转答了白求恩的感慨。

“白大夫，您现在的身体怎样？我们这儿条件太艰苦了。”

“我很好。只是战士们太辛苦了。”

“是啊，连子口战斗，夺取最防地，我们的战士负出的代价太大了！”

“能为这么可爱的士兵治病，贺师长，我诺曼尔·白求恩十分荣幸！”

“……”

虽然他们边走边谈的声音不高，但是，我们师直机关的青年们，往往都爱恭耳细听，也能听得清楚。我当时非常爱听白大夫和贺师长的笑声。他们的笑声充满了诚挚的友爱，洋溢着必胜的信念。我只要想起他们的笑声，无论是在青纱帐里还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壕里，总感到浑身有一种热力，沉浸在一种令人陶醉的想象之中。

连子口战斗后，一个秋天的傍晚，我们师直属部队在一个村庄的打谷场上开大会。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打谷场周围的高耸入云的杨柳树梢上，落满了一群群寻找归巢的鸦雀。它们吱吱喳喳的叫声，被部队洪亮的战歌声压了下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歌声，此起彼落。群鸟惊起，飞向远方。

“唱得好不好？”

“好！”

“妙不妙？”

“妙！”

“通信营再来一个要不要？”

“要！”

热烈的掌声，不绝于耳。

“起立！”值星员发出口令，部队全体持枪立正，一片肃静。只见值星员——一位年青高个子的军务处长，跑